

【牖 髓】
【公牖学史】

清·许同莘 著
杨群 注释

一个师爷的

执笔经



中国师爷名著丛书 李 乔 主编

一个师爷的执笔经

(清)许同莘 《牍髓》

杨 群 注 释

九洲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师爷的执笔经/(清)许同萃著;杨群注释.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10

(中国师爷名著丛书/李乔主编)

ISBN 7-80114-318-3

I. —… II. ①许… ②杨… III. 文言文-公文-写作
IV. 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488 号

一个师爷的执笔经

主 编 李 乔

出 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5.2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4-318-3/G·150
定 价	14.50 元

总 序

从明朝中晚期,历经清朝一代,降至民初,在大约3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官府衙门中,活跃着一批被人们称为“师爷”的人物。“师爷”是一种俗称,正规些的叫法应是“幕客”、“幕宾”;但师爷一称最为广泛,也最为今人所熟悉。由于绍兴人当师爷的极多,且遍布全国,名声极大,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专门称谓——“绍兴师爷”。“绍兴师爷”一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经辗转流传,几近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清代有句谚语,叫作“无幕不成衙”,意思是:一个衙门,若是没有幕客,即师爷,也就不成其为衙门了。也就是说,有衙门必定有师爷。这句谚语,反映了师爷在当时社会中极为兴盛的实况。

师爷是地方官府中的主要官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物,他们从主官(幕主)那儿拿薪水,只对主官个人负责。师爷“佐治”的内容,包括帮助主官判案、催收钱粮、书写信札文告等等,因之师爷又具体分为刑名师爷、钱谷师

爷、书启师爷(又名文案)等名目。清代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所著的小说《文明小史》第30回写道:“什么叫作‘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所谓“作幕”,就是佐治当师爷;刑名、钱谷老夫子是师爷中最重要的两种。

师爷是官府衙门中极为活跃、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被主官“倚为左右手”,不可或缺。他们本身虽然不是官,却“操三寸管,臆揣官事”,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他们名义上虽是“佐官以治”,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代官出治”。他们是一群没有官位、官品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活动,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我们知道,明清之际,相当多的地方官是科甲出身,终身所习,无非八股,脑袋里除了“起承转合”就是子曰诗云,一旦外放为一方父母官,催粮征税,审人判案,送往迎来,做报告递文呈,一样也做不来,在事务堆里,脑袋一盒浆糊,所以非得有具有“专业知识”的师爷帮衬乃至替他们当家不可。府县两级的师爷是低级师爷,大都来自绍兴,大抵功名不高,甚至没有功名,但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世代相承,秘不外传,俨然是一门独家手艺,明清两代几乎所有基层的政务,全由他们一手包办。实际上,师爷从聘他们的地方官手里领得的薪水往往是象征性的,一旦入幕,行政机器运转起来,他们自然会按“行规”收取“该得”的门

包。

道台以上的官所聘之幕僚系高级师爷，他们大抵有高级功名，至少是个举人，当然也有以秀才之身因特别出色，被人看准的，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更重要，因而威风得紧，当年左宗棠给骆秉章做师爷时，所有军政大事，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山的父亲身为正二品的总兵，只因惹着了左师爷，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包办奏章的文案夫子一枝笔往往又毒又狠，夸谁可以使之上天，整谁就叫你入十八层地狱。当年曾国藩要参勒翁同书，无论如何参不动，李鸿章（时为曾之幕僚）一枝笔，立马给翁判了个“死缓”（斩监候）。另外，象为了给某武员掩饰败绩，而上奏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的生花之笔，也是师爷的杰作。

正因为如此，凡是师爷，在官衙的地位都不低，他们被称以“老夫子”或者“老师”，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仅使王朝的政治机器得以正常运转，也让一代代的官员学会了如何处理公务。清代许多著名人物和民国以来的许多名人的先世或亲戚，都当过师爷。这是师爷曾经广泛存在的鲜明历史印记。例如，清代著名思想家李恕谷当过桐乡县令郭子坚的师爷，名幕兼学者汪龙庄当过16位幕主的师爷，著名学者孙星衍当过陕西巡抚毕沅的师爷，《聊斋志异》的著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林则徐当过两江总督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

戊六君子之一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袁世凯和《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都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秋瑾的祖父秋桐豫当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师爷，辛亥革命志士朱执信的先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先世、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父亲，都当过师爷。鲁迅先生家族中有十多人当过师爷。例如，其表兄阮和荪长期在河北、山西等地当师爷，辛亥革命后在北京谋事，《鲁迅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载有七十余处之多。鲁迅的表弟阮久荪，也在山西当过师爷，后患精神病来到北京，鲁迅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很有些阮久荪患病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位当过师爷的阮久荪就是“狂人”的原型。还有，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和外祖父万青选也都当过师爷。

凡是当过师爷的人再走仕途，往往都会化为非常干练而且务实的官僚，因为作幕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作官的经验。至少，他们不再会被人蒙了。

师爷，不论是从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讲，还是从许多名人与他们的关联讲，他们都是值得史家认真注意、好好研究的一个社会群体。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师爷都不是好人，而是一群心术不正、阴险奸滑、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的家伙。在不少小说和戏剧中，师爷也被派为反角，成为人们奚落和嘲讽的对象。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以偏概全的误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师爷是有良莠之分的，好师爷在历史上被称为“良幕”、“上幕”，坏师爷被称为“劣

幕”；师爷的良莠是有发展阶段的，从师爷的整体状况看，清朝中期以前，师爷中“良幕”居多。清朝中期以后，师爷逐渐“劣幕化”，坏师爷越来越多。但即使到了晚清，也不能说凡师爷皆坏。若是把师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就更可以看出，对师爷是不能笼统否定的。“师爷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师爷因长期操办具体事务而养成的周密的思维方式和干练的办事作风；刑名、钱谷、书启师爷在法律、财会和文书业务上的办事技能；许多师爷是诗文家、学者，他们写出的文章、诗词、学术著作、笔记小说，乃至尺牍、日记，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若是把 300 年来的师爷以及曾经当过师爷的人写的作品统统网罗起来，一定是极可观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但这很难做到，也无此必要。有选择地编辑、注释若干位师爷以及曾经当过师爷的著名人物的著作出版，则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我们从这些著作中，不仅可以了解到师爷这一社会群体的概况，而且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和官衙中的许多情况，还可以通过这些作品的丰富内容和优美的文笔学到许多知识和作文的方法。我们编选这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的立意就在于此。

这套丛书共 7 种，每种为一部或两部师爷著作。为突出每种书的主要特点，便于今人把握，7 种书全部加了新题，这 7 种书是：

1.《一个师爷的官场经》

包括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正续）、《佐治药言》（正

续)

2.《一个师爷的办案经》

包括清·王又槐《办案要略》、佚名《刑幕要略》

3.《一个师爷的执笔经》

清·许同莘《牍髓》及《公牍学史(清代)》

4.《一个师爷的牢骚话》

清·龚未斋《雪鸿轩尺牍》

5.《一个师爷的家常话》

清·许葭村《秋水轩尺牍》

6.《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

清·杨恩寿《北流日记》、《长沙日记》(节选)

7.《一个师爷的生活自传》

清·沈三白《浮生六记》

这7种书的著者,皆为清人。清代的师爷最为典型,这7种书也具有较强的典型性。这些著者中,有的一生做师爷,有的先做师爷后当官,有的又当师爷又经商,有的一生做了许多事,当师爷只是一段生涯。因为这套丛书突出的是“师爷”这一特点,所以入选这些著者的著作时,特别注意了所选之书的“师爷性”,即入选之书必须与著者当师爷的生涯有关。《浮生六记》虽然以往出版过,但从无人注意其“师爷性”,收入这套丛书,这部书的“师爷性”才可以凸现出来。收入这套丛书的几种书,都是在某一方面很有名气的,所以都可以称之为“师爷名著”。从文体上说,这些书包括了论说、书信、日记、自传等几种

文体,可以多角度地反映师爷的情况。

师爷虽是中国的土特产,但人们真正认真地研究他们、认识他们,通过他们去认识中国社会,还只是近年的事。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可做;选编师爷著作,是其中的工作之一。我担任主编的这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是编选工作的一个尝试。陆放翁有诗云:“斜阳徙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这我不信。我信胡适先生的话:“天下绝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功的事。”所以我尝试一下。我感谢和我合作的几位编注者,他们和我一道进行了尝试。我们的尝试是否成功呢?还要请读者来评定。

李 乔

1998年3月31日下午

于京西之草莽居

一个师爷的执笔经

杨 群

4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书，名为《公牍学史》。据专家考证，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采用“公牍学”名称的专著，也是第一部对公牍之产生、发展、变化情况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别论述上古三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六朝、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文书之特点及制度流变之大略，另附自上古以迄近代不同政权往来文书、辞命的范文，并论述其特点；第二部分名《牍髓》，重点论述治牍者自身所应具备的诸条件，如情操、修养等，同时详细阐述为文的基本原则以及撰述公文的技术等。

何谓公牍？纸张未被发明前，言政事多书于竹木，称之为“牍”。后未尽管有了纸，但此称法未变。又因后末私人书信也称牍，如“尺牍”之类，为示区别，遂在牍前加一“公”字。此即公牍之由来。简言之，公牍即公文。

公文在今天的使用意义已是很宽泛的了，只要不关及个人私事之文，均可称公文，然公牍之意则要狭窄多

了,主要是指关系国家政事之文,也就是国家各级政府为处理各项政务而行用之文。就这一意义而言,公文之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而《公牍学史》之《牍髓》之于治公文者,其意义亦自不待言了。

《公牍学史》的作者姓许名同莘,字溯伊,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江苏无锡人,庚子、辛丑并科举人;曾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入封疆大吏张之洞幕。1912年民国建立后,他曾任北京政府外交部佥事,后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等职。终其一生,许同莘一直从事秘书工作,历经清末与民初两个历史时期,且有在中央与地方任职的不同经历。长期的秘书生涯,不仅使其得悉官场的层层内幕,更使其对秘书之职责尤其是为文之道,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其在《牍髓》中对幕职人员(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秘书,但更宽泛)修养与情操等基本素质的阐述,对于为文的基本原则以及撰拟技巧的论列,既是对前人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也是其个人职业生涯的总结,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其传统文化的素养以及治牍为文的思想境界。这样的归纳总结,对于后人来说,无疑是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的。

那么,许同莘对于幕职工作及其为文之道又是怎么看的呢?与许同莘同时代的杨寿楠说:“窃以为公牍之学,世俗视为刀笔筐篋俗吏之所为,不知关系国计民生利害者,至深且巨。词以明洁为主,意以精密为归。拙者为之,则肤泛而不切事情,曼衍而不知体要。文人学士,鄙

为末务，或终身未涉其樊；簿书之吏，虽习文法，而罕明其理。是书出而后人知政事文章为一贯，用以究古今之流变，观政学之会通，岂徒抱牍操觚者稟为程式而已哉！”通观许氏所论，可知杨寿楠的评述是中肯的，恰当的。许氏确是从“政与学”、“政事与文章”的高度来看幕职工作及其为文之道的。

《牍髓》分内外二篇。内篇着重阐述治牍者所需具备的基本素养，作者根据自己的认识，依其重要性，分六个方面加以论述，即：积学第一，晓事第二，立诚第三，得中第四，养耻第五，去忍第六；外篇则着重阐述公文撰拟的要旨，亦分为六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即：述指第一，法后第二，通俗第三，酌雅第四，甄微第五，虑远第六。

就治牍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而言，作者尤为重视积学与晓事。所谓积学就是不断学习，充实自己，而晓事则指明辨事理。作者指出：“未有不学而可以从政，亦未有从政而可以不学者也。”“凡数，始于一，终于十。穷究一切事物而返之于约，是之谓士。凡居位任事者，必如是方为称职，故曰学优则仕。事理无穷，谓入仕以后便可不学，无是理也，故曰仕优则学。仕宦而不读书，天稟虽高，无益也。”作者的这一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适用的。社会在不断发展，知识在不断更新，学问何有穷期；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方不至于落伍，方能够临大事而不惑。对于那些以“一行作吏，此事便废”为借口而不勤于学习的人，作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以唐代杜佑

积 30 年之功，在繁杂事务之余，撰成《通典》为例对其加以批驳。对于晓事，作者强调，知人晓事，明辨是非，是治牒之要。“治事之道多端，而辨别是非为急。自来言治道者，首在知人安民。欲安民，先知人；欲知人，先晓事”。晓事是治道的根本，也是治牒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不晓事则无以治事，更会带来极大祸害。“不晓事之害，不在小人而在君子。小人不晓事，犹不能为大恶；君子而不晓事，则一言出万口附和，贻害不可胜言”。确实如此，作者所言决非危言耸听，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关于立诚，作者指出：“物腐而虫生，气虚而疾至者，为其有罅隙，而外物乘之而入也。政事亦然，奸蠹之萌，邪慝之作，皆由于徒饰虚文，而无精神贯注，是故政治不可为伪，去伪莫如诚。”联系到治牒，作者强调：“文不贵乎能言，而贵乎不能不言。譬犹云既瀚而灵雨不得不降，气既至而蜚雷不得不鸣。雨降而生物润，雷出而地材奋。”能言不为贵，并不是说其不重要，而是说所言之事已得认同，说之无妨；不能不言，则是对为文者的一种考验，不能不言之事，或许触犯上司，或许触犯众怒，言之则有诸多不利，反之则皆大欢喜。再者，只有殚精竭虑，费心谋划，方能谋深虑周，亦方能将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见诸于笔端，防患于未然。

以下养耻、得中、去忍等节，作者强调治牒者乃至治事者应有中正平和之心，待人处事应平允，同时要实事求是和把握好分寸，不为己甚，不作过苛之论。作者在例举

光绪初年，四川东乡县因捐输过苛，乡民愤激，而县官处置失当，办牍者亦未能妥贴办理，结果使无数百姓惨遭屠戮的例子后，指出：“此案发端，不过乡民聚众抗捐耳。派兵剿办，已为孟浪，因此而痛加剿洗，其残酷无理，直盗贼之不如。文格、孙定扬之徒，左右掾吏，岂无一二晓事者？总缘军兴以后，习于杀戮，以派兵剿办为常事，轻率下笔，心粗手滑，遂致成此大错。”

治牍固须具备基本的情操、修养等条件，但仅有这些是否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治牍者呢？在作者看来，这些还是不够的，在实际的工作中，必须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熟悉、了解各种不同公文的撰拟要旨，把握一些基本的撰拟技巧，方能够算作是合格的治牍者。那么，在作者看来，公文撰拟的要旨及其基本技巧包括哪些内容呢？概括起来，作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大要点：

第一，治牍之前要认真阅看有关材料。作者认为，“大凡一事之起，有近因，有远因”，对此必须认真阅看有关材料，了解情况，如此方能做到下笔有数，胸有成竹。对于远因，尤要注意，因为，“远因者，或伏根于数十年前，或牵涉于本案范围之外，经若干人之手，缴绕错互，猝难得其端绪”。对此，治牍者应平心静气，逐一阅看材料，寻找其中提纲挈领之文，则纲举目张，对事情的经过就可有一个概略的了解，把握其中的关键。如此则可事半功倍。另外，认真阅看有关材料，亦可就有关问题学习前人的长处，吸取前人的教训，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执笔办稿的能

力。

第二，全面考虑，不能只见眼前之事，要面面俱到。作者认为，下笔前，要对有关情况有个通盘考虑，不能率然下笔；率然下笔，往往留下漏洞，以致以后出现麻烦。“如讲求水利，必须顾及水患；剿办土匪，必须虑及骚扰良民；筹议捐税，先须计及民力能否担负”。也就是说，对于所言之事，多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尤其要考虑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预为对策，不至问题出现了，束手无策，给自己平添麻烦。

第三，治牍要参以“活笔”，要留有余地。所谓活笔，即是在行文中预留伸缩余地，不要将话说绝，一旦以后有事，可以补救。但作者强调，活笔并非指态度、内容模糊，“公牍须参活笔，指收束结穴处言之。若中间议论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则必须反复透澈，不可为模糊影响之谈”。再者，“事理必与时势相因，时势变化不常，则事理亦不可拘于一隅，不知应变。就目前而论，此事必须如是，此文亦必应如此措词，方合分际。然时移势异，又将如何？故下笔不可说呆，尤不可说尽”。

第四，行文要平实，切忌虚华。作者指出：“诗文之诀，意翻空而易奇，辞征实而难巧。公牍不贵奇，愈平实愈有力量。故言高下深浅者，必计其实数，谓‘壁立千仞，下临无地’则诞矣；言洪纤广狭者，必适如分际，谓‘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则谬矣。”这是公文的特点所决定的，亦是治牍者所必须牢记的。“议论当平易近人，识见须高人一著”，

“辞胜于理，不若理胜于辞”，治牍者必须注意这些。

第五，善谋篇、段落、字句，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字句洗练。所谓谋篇，即是在下笔之先，有个通盘打算，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大凡头绪多者，须于入手处先提纲挈领，令阅者一望而知其大概”；所谓段落，就是将所要议论之事，分若干层次，层层相因，一段一段地写下来，如此，“分类显明，则意义显豁”；所谓字句，就是要讲究遣词造句之法。“句法欲其简，不欲其繁；欲其显，不欲其晦”。如说灾荒民无以为食，树皮草根剥掘无遗，则用“告贷无门，典质俱尽”八字即可涵括一切；用字，“则以意义坚卓声音响亮为贵，如言数目，则以强字弱字示多寡之数，言服制则以等字差字亲疏之别，言性情则以勇怯明昧示性格之异”；如同一语句，则要注意音调之高低，“抑音高下，便觉易于动听。否则格格不吐，听者厌倦，功用全失”。

第六，可正面、旁面、反面写，亦可进一步说，退一步说，以加强之意。所谓旁面、反面写，即“论正理当如是，反而言之，谓不如是则将如何，是反面著笔。就侧面言之，谓某事犹且如何，况于此事？是旁面著笔”；所谓进一步说、退一步说，就是说某事即使顺利进行，亦未必有何益处，更何况成功与否，尚难逆料，怎可作此之想，这就是进一步说；如说某事完成之时，往往横生波折，败于垂成，而今刚进行即已多方掣肘，即使最后成功了，亦多属天幸而非全凭人力，此即退一步说。作者认为这是为文的要诀，亦是治牍的要诀，“明此法则曲畅旁通，发挥尽致矣”。